

# 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

## ——记王夫之学术思想讨论会

今年,是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象王夫之(1619—1692)逝世290周年,为纪念这位哲人,武汉大学哲学系部分教师和79级学生结合中国哲学史教学,举行了王夫之哲学思想讨论会。多数同志肯定王夫之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展示了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思想锋芒,不愧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代表;但不少同志指出,王夫之在不少地方未能越出封建思想藩篱,他的哲学思想中的矛盾,是我国十七世纪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。现将部分同志发言摘要整理如下:

### “即欲见理”思想的启蒙性质

余金华:明中叶以来,我国封建社会母腹内,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。明清之际,古老的中国,走上文艺复兴的特殊道路,兴起早期启蒙思潮。王夫之是这一思潮的哲学代表。他的理欲观,充分显示了早期启蒙思想的特征。宋儒发展孔孟“讳利言义”的思想,汲取佛老以情欲为罪恶的谬论,叫嚣“灭尽人欲,复尽天理。”这支禁欲主义思潮,恰似一把软刀子,绞杀了无数封建思想的叛逆者。王夫之等思想家,以其思想的“三棱镜”,折射出当时起义农民的“平均”思想和新兴市民的“平等”要求,提出“人欲之各得,即天理之大同”的思想纲领,认为仁人君子“只于天理人情上絜着个均平方正之矩”,应当“好民之所好”,“恶民之所恶”。他的社会主张是:“有其力者治其地”,“人可有田而田自均”,实现“平天下”、“均天下”的政治局面。凡此均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,而予禁欲主义以有力打击。王夫之被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引为思想先驱,谭嗣同赞美王夫之思想为“昭苏天地”的“一声雷”,绝非偶然。

肖洪恩:称王夫之为早期启蒙思想家、未免过誉。他的思想未能也不可能跳出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窠臼。所谓天理人情上的“均平方正之矩”,实质是更好稳定封建社会秩序,要“秩以其分”,“协以其安”,使统治者和人民都安于封建统治的名分。他“惟恐薄于欲者乃薄于理”,力图抑制“暗君、墨吏”的非分之欲,使之勿过分剥削人民,以免危及封建

统治的长远利益。对劳动者他仍主张“以理统欲”,否则斥为“庶民禽兽”,与宋儒“去人欲,存天理”之说,殊途同归,称之为新的禁欲主义,更为恰当。

覃正爱:说王夫之思想基本上未跳出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窠臼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他主张“奉常以处变”,“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”,他说的“大常”,就是整个封建统治秩序。他主张依靠掌握“贞一之理”的圣人,“持静正之风裁”,分析“民之好恶”,推行“援天以欢民”的准则。他实际上贬低人民的情欲要求。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,敌视农民革命,这不是偶然的。不过,完全忽视他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贡献,也欠公允。他们对人民苦难的处境是有所同情的,对封建专制进行了批判,指出“天下非一姓之私”,“必循天下之公”。认为对于“暴君”、“暗主”,可以“易吾其主,杀此有司,以抒吾怨”。主张“以天下之禄位,公天下之贤者”。不难看出,王夫之虽非早期启蒙主义者,其思想却包含着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萌芽,对酝酿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,发挥了醇醪的作用。否则,谭嗣同说的“惟国初船山先生,纯是兴民权之微旨”,岂不成为无稽之谈。

### “合二以一”论的是与非

陈金清:王夫之生活在新旧杂陈的矛盾时代他的矛盾观,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。他发展《易传》和张载的思想,肯定事物的运动变化,在其内部的矛盾。“一物之中,二端既肇,摩之荡之,而变化无穷”,“天下之变万,要归于两端”。由于事物之中对立统一的“两端”,相互“摩荡”,促使事物“推故而别致其新”。认定事物之中,对立的双方,相互依存,不可分离,“乾坤并建,时无先后,权无主辅”,“无有乾而无坤之一日,无有坤而无乾之一日”。他对矛盾的同一性,有较深刻的认识,认定“天下无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”,一切事物矛盾双方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。他声称,“天尊于上,而天入地中,无深不察;地卑于下,而地升天际,无高不彻,其界不可得而剖也”。大胆地否定了“天尊地卑”的封建名教,对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予以勇猛冲击。由

于他的地主阶级立场,不可能将这种矛盾转化思想贯彻到底,他夸大矛盾同一性,在“分一为二”的前提下,力图发挥“合二以一”的思想,认为“合二以一”乃“分一为二”所固有。强调“反者有不反者存”,“太和,和之至也”。认为一切“相反而相为仇”的事物,最后总是“互以相成,无终相散之理”,应当“和而解”,陷入了矛盾调和论。以此指导实践,他试图劝说残明封建武装力量与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,共同抗清,这一联盟的希望,终成泡影,表明了这种错误理论必然破产。

汪世锦:王夫之重视“合二以一”,认真研究了矛盾的同一性问题,但不能因此斥之为矛盾调和论。他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基本原因在其内部矛盾双方的“相摩相荡”,这就无异肯定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。在承认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的前提下,重视矛盾的同一性,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积极意义。解决矛盾的方法有多种,依矛盾的特点而定。如要驮东西的毛驴上山,就有一推,二拉、三打等办法。王夫之在清兵入关,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情况下,主张调解明军与农民军之间的矛盾,联合起来,共同抗清,以免抗清势力各自孤军奋战,同归于尽,这不是什么矛盾调和论,而是“更新而趋时”的有远见的倡义。两支抗清力量联合未成功,就被清军各个击破,并不能证明王夫之理论的错误。

### “以人造天”思想的正确评价

王礼金:王夫之在认识论上比所有旧唯物主义者高明的地方,在于他在同“知行合一”、“知先行后”等唯心主义思想斗争中,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,充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。他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所固有的各种能力,就可认识自然规律,进一步改造自然。“知天之理”就可“善动以化物”。“竭天之能”,就可“以人造天”。所谓“竭天”,就是通过自觉的锻炼,充分发挥自然赋予人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的能力。他斥责那些“任天而无能”的人,与专凭本能生活的禽兽差不多。“以人道率天道”,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标准。他说:“可竭者天也,竭之者人也。人有可竭之成能,故天之所死,犹将生之;天之所愚,犹将哲之;天之所无,犹将有之;天之所乱,犹将治之。”这就是说,尽量发展人的聪明才智,可以起死回生,化愚为哲,变无为为有,拨乱反治,肯定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,揭示“以人造天”的原则,批判听天安命的宿命论。王夫之大大超越荀况“制天命而用之”,刘禹锡“天与人交相胜”的思想,在阐述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,达到旧唯物主义者前所未有的水平。

余正荣:王夫之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,固然有极卓越的见解,但我们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,

仍应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,予以全面剖析,不可忽视在这个问题上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。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的论述,还缺乏科学性。科学的能动性思想的产生,一般应具备两个理论前提:一是有辩证思维特征的自然科学,二是有真正的历史科学。不言而喻,王夫之生活的十七世纪的中国,二者都不具备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,关键在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。王夫之所谓的“行”,充其量不过是地主阶级革新活动和反清的民族斗争,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实践范畴的高度,远不是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,所谓“以人造天”的“人”,局限于贤人君子;所造的“天”,也越不出封建阶级革新派的眼界。他的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为旧唯物主义哲学增添了光辉的篇章,为科学的主观能动性思想作了理论准备,而同辩证唯物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却相去甚远。

### “推故致新”思想的精义

王夫之的发展观中,有无质变思想,是讨论的问题之一。有同志认为,王夫之主张“天地之化日新”,一切事物时时处在“新故密移”之中,事物变化的结果,是“推故而别致其新”。“由致新而言之,则死亦生之大造”。旧事物在不断死亡,新事物在不断出现,造成了“古所无者,今日之繁然而皆备”。在中国哲学史上,关于质变的思想,这是阐述得最精辟的。

邓红蕾:王夫之发展张载“变言其著,化言其渐”的思想,把事物的变化归结为两种形式,即内成与外生。“内成,通而自成”,指事物的不断自我更新;“外生,变而生彼”,指旧事物消亡了变成了新事物。以生物变化为例,有胚胎、流荡、灌注、衰减、散灭五个阶段,前三者属生物同化阶段,后二者属生物异化阶段。王夫之看来,同化阶段的变化,是“形不变而质已迁”是新质不断积累的过程。这涉及事物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变化的不平衡性问题。本质属性是相对稳定的;非本质属性是变动不居的。比如一个人,由婴儿、幼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,各个阶段都有质的差异,属于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,直到死亡,才是根本质变。王夫之是以“内成”式的变化来看待社会的变化,明代社会经过清初的风云突变,仍复归于封建专制的旧路,旧的封建制的统一体,为新的封建制的统一体所代替,亦犹如“形未变而质已迁”。王夫之处于明清之际那“新的突破旧的”,而“死的仍拖住活的”那种历史条件下,他的“理势统一”的进化史观,在社会问题上,也只能得出“日新而不爽其故”的结论。不难看出,他的发展观,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。

(哲学系七九级报导组)